



# 说“琕”之形制

◆ 顾莉丹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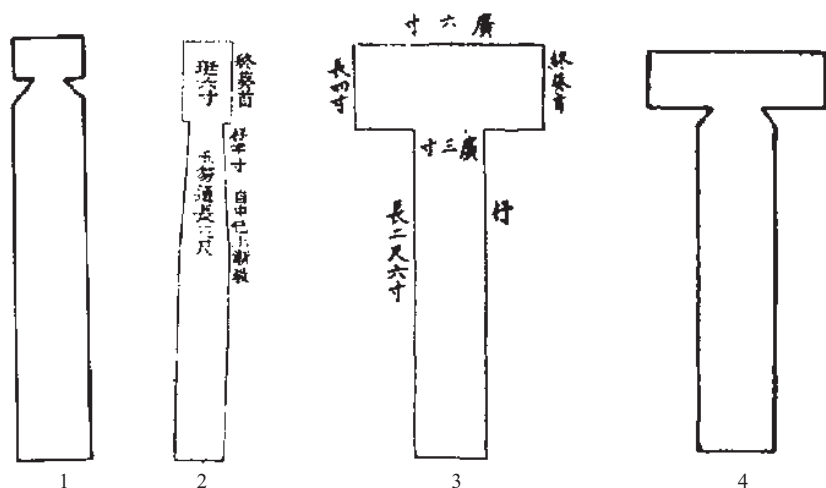
◆ 汪少华

“琕”是文献中常见的天子所服之器,《说文·玉部》:“琕,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许慎所据乃《周礼·考工记·玉人》<sup>①</sup>:“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玄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谓之琕。终葵,椎也。为椎于其杼上,明无所屈也。杼,綯也。《相玉书》曰:‘琕玉六寸,明自炤。’”

“琕”又谓之“大圭”,亦谓之“笏”,三者异名同物。据孙诒让考证:《左传·桓公二年》孔疏引徐广《车服仪制》的说法与郑玄相同:“琕,一名大圭”。《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云:“天子御琕,诸侯御茶,大夫服笏。”《荀子·大略篇》同。《隋书·礼仪志》引《五经异义》、《太平御览·服章部》引《五经要义》,都认为“琕”是天子笏。《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琕,玉笏也。”《广雅·释詁》、《周书·王会》孔传、《穆天子传》郭注也都以“笏”、“琕”互训,这表明“琕与笏异名同物”。《周礼·春官·典瑞》记载天子晋大圭以朝日,《管子·轻重己》说天子搢玉笏祭日,这更是“大圭与琕同为玉笏之确证”<sup>②</sup>。

《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云:“天子御琕,诸侯御茶,大夫服笏。”王聘珍解诂:“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谓之御。”“琕、茶、笏”为君臣相见所持之物,其质地与形制随地位高低略有不同,散文可通称作“笏”,如《广雅·释器》:“琕、琕,笏也。”“琕”即“茶”。《释名·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此音训释“笏”命名缘由。《广韵·没韵》:“笏,一名手板,品官所执。天子以玉,诸侯以象,大夫鱼须文竹,士木可也。”《广韵》所引乃《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此言质地之不同,天子尊服用玉,故其所持之“琕”又可谓之“玉笏”,《左传·桓公二年》“衮冕黼琕”杜注云:“琕,玉笏也。”由此可知,因地位尊卑不同,天子、诸侯、大夫所执之物质也有别,此外

它们的形制也有差异。《礼记·玉藻》:“天子搢琕,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茶,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直,无所不让也。”诸侯之制,长二尺六寸,中间宽三寸,下端也是三寸,上端左右略有削减,其宽度为中间宽度的六分之五,此即“杼上”(上端略削减收缩),而天子之琕是在此之上有“终葵首”。“终葵首”是何形状?郑玄释“终葵”为“椎”:“为椎于其杼上,明无所屈也。”《礼记·玉藻》“天子搢琕,方正于天子也”郑玄注另有描述:“终葵首者,于杼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是谓无所屈,后则恒直。”后代学者遂以“终葵首”之形为“方如椎头”,如《荀子·大略》杨倞注:“琕,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谓剡上至其首而方也。”孙诒让疏:“言所杼之上,又广其首,广於琕身,头方如椎。”东汉以后的礼图如郑玄、阮谿、夏侯伏朗、张镒、梁正诸家之学均不传<sup>③</sup>,唯有宋代聂崇义纂辑的《三礼图》二十卷行于世,其所绘“大圭”之形(如图一,1),琕的端首下两边往内略有削减,即“杼上”,略杀后又逐渐恢复到与底部等宽,呈方首形。清戴震《考工记图》绘有“大圭”(图一,2),认为大圭便是玉笏,大圭之首称“琕”,大圭底边宽三寸,从中部往上略减(聂图则中上近端首处有削减),到与琕(大圭之首)相接的地方左右往内缺,余宽为二寸半,其上是琕,即大圭之首,呈宽三寸长六寸的长方形,宽与底部等同<sup>④</sup>。案经文文明言大圭又谓之琕,戴震以琕专指大圭之首,不合经文。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根据《玉人》“琕长三尺”、《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推算出琕首长四寸,又据《相玉书》“琕玉六寸”,得出琕首是宽六寸、长四寸的长方形。琕身与笏相同,是长二尺六寸,宽三寸的长方形,琕首置于琕身之上,其附图如“T”形(图一,3)<sup>⑤</sup>。黄以周为求与郑注“方首”吻合,重点考证琕之首,但忽略了经文的“杼上”。琕之上端“渐杀”为定制,各位学者虽然对于“终葵首”意见不一,但“中上渐杀”没有异议,黄以周所论未安。钱玄



图一

1. 聂崇义《三礼图》 2. 戴震《考工记图》 3. 黄以周《礼书通故》 4. 钱玄《三礼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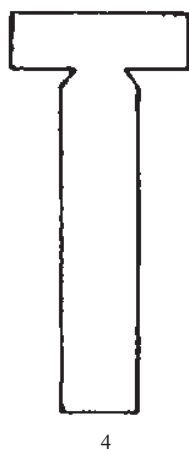
《三礼通论》所绘“大圭”图(图一,4),在黄以周的图上补充了经文的“榘上”,端首与榘身相接处两端略向内削减,端首是宽六寸的长方形<sup>⑦</sup>。

以上所引各家之说及绘图,“终葵首”形状和尺寸虽略有差别,但都认为大圭的端首是在“榘上”的基础上加宽的方形,依据都是郑玄注。

但是,这种方首的大圭迄今尚未见到出土实例。因而孙庆伟《〈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指出:“在出土物中还不能确定何者为大圭,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这一类器物确实还没有发掘到;二是文献记载有误。”这一推测的前提,是后世学者认为“终葵首”是“方首”。然而“方首”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考工记·玉人》原意,从郑注以来一直存在误解。

《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榘上,终葵首。”“终葵”是齐语对“椎”的称呼。“椎”是捶击工具。《说文·木部》:“椎,击也。齐谓之终葵。”段玉裁注据《考工记》及郑玄注在“击也”前补“所以”二字,认为“器曰椎,用之亦曰椎”。“椎”也写作“锤”、“鎚”、“槌”。宋戴侗《六书故》卷二一指出“椎”“与锤通,俗作鎚、槌、相”。元蒋正子《山房随笔》所记王文炳《铁椎铭》,铭文说的是“鎚”。据陆锡兴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兵器刑具》:“锤起源于原始人类追杀野兽、敲砸果壳的短木棒。为增加砸击力量,人们在木棒顶端安装一石块,就产生了最早的石锤。”“椎”有首有柄,《淮南子·说林训》:“椎固有柄。”《墨子》记述了椎柄和椎首的尺寸:“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备城门》)“椎,柄长六尺,首长尺五寸。”(《备蛾傅》)<sup>⑧</sup>去掉柄,剩下的就是椎首。鉴于《考工记》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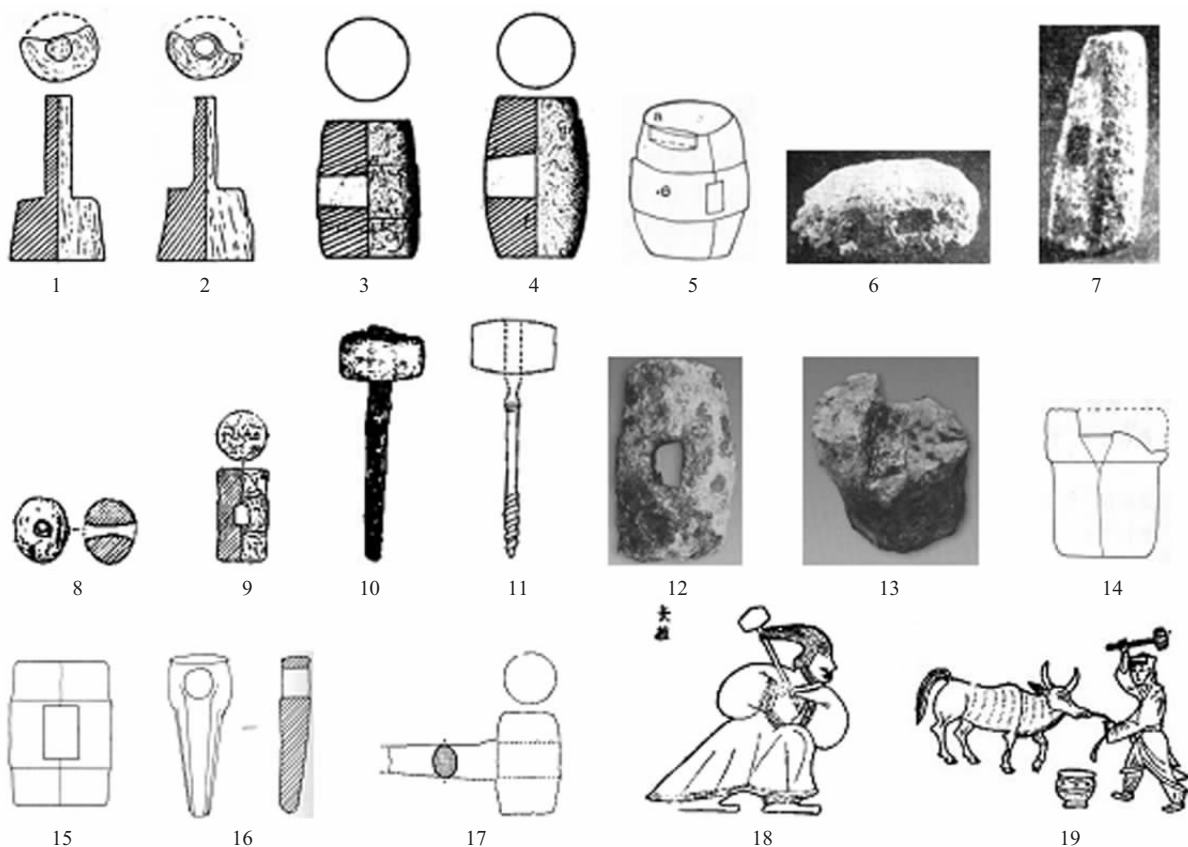
书年代和郑玄所处时代,我们集中考察出土所见的战国秦汉铁锤(鎚)、木槌实物:



长沙战国墓出土铁夯锤是直筒形<sup>⑩</sup>,山西长治战国墓出土铁鎚呈圆柱形<sup>⑪</sup>。湖南麻阳战国时期铜矿出土十件木槌,两件保存完好,槌体偏圆形,上窄下宽,断面成一梯形,一件槌体上径9.5×10、底径10×12厘米(图二,1),另一件槌体上径8.8、底径11.4厘米(图二,2);出土二件铸铁铁锤,保存完好,圆柱体,两端齐平,中部略鼓,呈一腰鼓形状,一件重

7.8公斤、高16.4、径8~10.4厘米(图二,3),一件重4.65公斤,高12.4、径8~9.6厘米(图二,4)<sup>⑫</sup>。湖北大冶铜绿山出土二件战国铁锤锤首,呈圆柱形,锤高13.7厘米,重6公斤(图二,5)<sup>⑬</sup>。秦始皇陵第三号兵马俑坑出土铁锤锤首,呈方柱形,高15.2、宽9、厚8厘米(图二,6);小铁锤锤首下宽上窄,由下往上逐渐收杀,高12.4、宽4.3、厚1~4厘米,重1.25公斤(图二,7)<sup>⑭</sup>。汉代铁锤实物有些是椭圆形(图二,8),有些是圆柱形(图二,9),中间有方釜,用来安木柄,锤的两头都可用来敲砸。有些下宽上窄(图二,10)<sup>⑮</sup>。咸阳市空心砖汉墓出土锤锤首呈腰鼓状,中间直径大于两端直径,中间往两端渐杀,长5.8、径3~3.8厘米,柄残长14.3、径1.1厘米(图二,11)<sup>⑯</sup>。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铁锤圆柱体,中部较粗,两端较细,其一(图二,12)高8、中部直径9、两端直径8厘米,其二(图二,13、14)残高7.3厘米,其三(图二,15)高7.5、两端径4.8厘米<sup>⑰</sup>。高庄汉墓出土铁锤(图二,16)呈八棱锥状,通长9.4厘米,平头钝尖<sup>⑱</sup>。满城汉墓出土铁鎚鎚首似腰鼓,宽5.9、两端径3、中腰径3.9、柄残长6.3厘米(图二,17)<sup>⑲</sup>。汉画像中也有椎的图形<sup>⑳</sup>(图二,18),这是作为武器的长椎。《史记·魏公子列传》:“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史记·冯唐列传》:“五日一椎牛”。画像石与壁画上都有椎牛者,山东沂南、诸城及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处所见的这类场面均相近似(图二,19)<sup>㉑</sup>。

显然,“椎首”的常态是圆柱形、椭圆形或腰鼓形,而不是方形。徐文生编《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第三册所收入出土的铁锤、铁鎚、木槌13件,没



图二 椎(锤、鎚)

有一件是方的<sup>②</sup>。最有说服力的是 1975 年河南镇平出土汉代窖藏铁器,其中铁锤范占 73%,圆形锤锤范有 56 件,方形锤锤范仅 1 件,铁锤 6 件均为圆柱形<sup>③</sup>。《六韬·军用》:“方首铁槌,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铁槌”以“方首”作限定或说明,可见非其常态。

既然“方”不是战国秦汉“椎首”的常态,因而《礼记·玉藻》郑玄注用“方如椎头”来描述物体形态的可能性极小,因为郑玄对物体的“方”“圆”毫不含糊。例如《周礼·地官·舍人》“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就器物外形而言<sup>④</sup>,簠方、簋圆,《仪礼·聘礼》“二竹簠方”郑玄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为之,状如簠而方,如今寒具筩。筩者圆,此方耳。”说明“竹簠”形状“如簠而方”,以当时的“筩”给“竹簠”作比况,还特别说明前者圆后者方的不同。准此,如果是描述“椎首”的物体形态,郑玄注应该说“如椎头而方”,而不是“方如椎头”。

“椎首(头)”有其寓意。“椎”是直而不屈的,下引两例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特点:《战国策·秦策三》:“三人成虎,十夫桀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淮南子·说山》:“三人成市虎,一里挠椎。”汉高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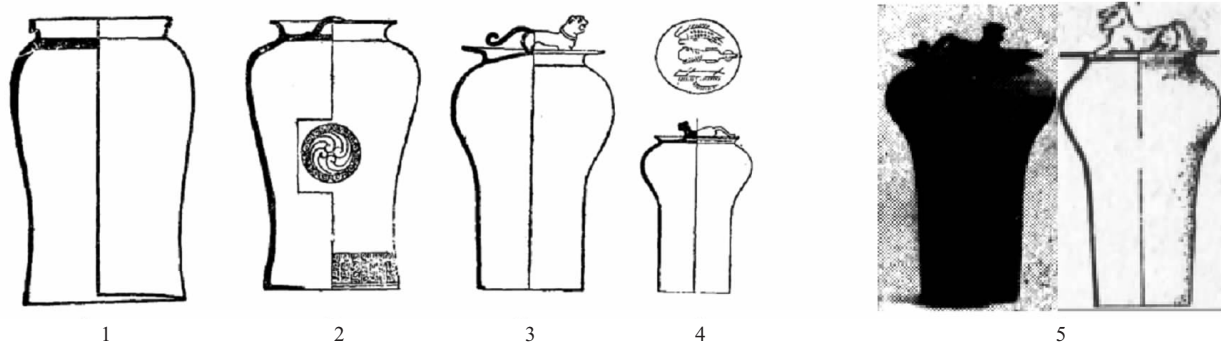
注:“一里之人皆言有屈椎者,人则信之也。”“椎”的这一特点可用来形容人,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评论周勃“椎少文”,裴骃集解引韦昭注予以说明:“椎不挠曲,直至如椎。”明了“椎首”的常态和寓意之后重温郑玄注,则不难领悟“方”应是对“椎”所寄托或隐含的意思:

《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玄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谓之斑。终葵,椎也。为椎於其杼上,明无所屈也。”

《礼记·玉藻》:“天子搢斑,方正於天下也。”郑玄注:“谓之斑,斑之言斑然无所屈也。或谓之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终葵首者,於杼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是谓无所屈,后则恒直。”

“大圭”的形状,《玉人》说“终葵首”,郑玄解释“终葵”就是“椎”,这是物体形态。“椎”这个物体所表明的是“无所屈”。《玉藻》说“天子搢斑,方正于天下也”,“方正於天下”是“天子搢斑”的用意,如《管子·形势解》“人主身行方正”。因为“斑”就是“大圭”,所以郑玄由前者的方正联系到后者的直而不屈,指出“斑”显示“斑然无所屈”<sup>⑤</sup>,而方正如“椎头”所表示的也是“无所屈”。由于物体的形态和寓意一





图三 鐃 于

1. 安徽宿县芦古城子遗址出土(春秋时期) 2. 湖南泸溪县出土(战国中晚期) 3. 湖南溆浦县大江口出土(战国末至西汉前期)  
4. 湖南龙山县招头寨出土(西汉中期至东汉) 5. 贵州省松桃出土的虎纽鐃于(战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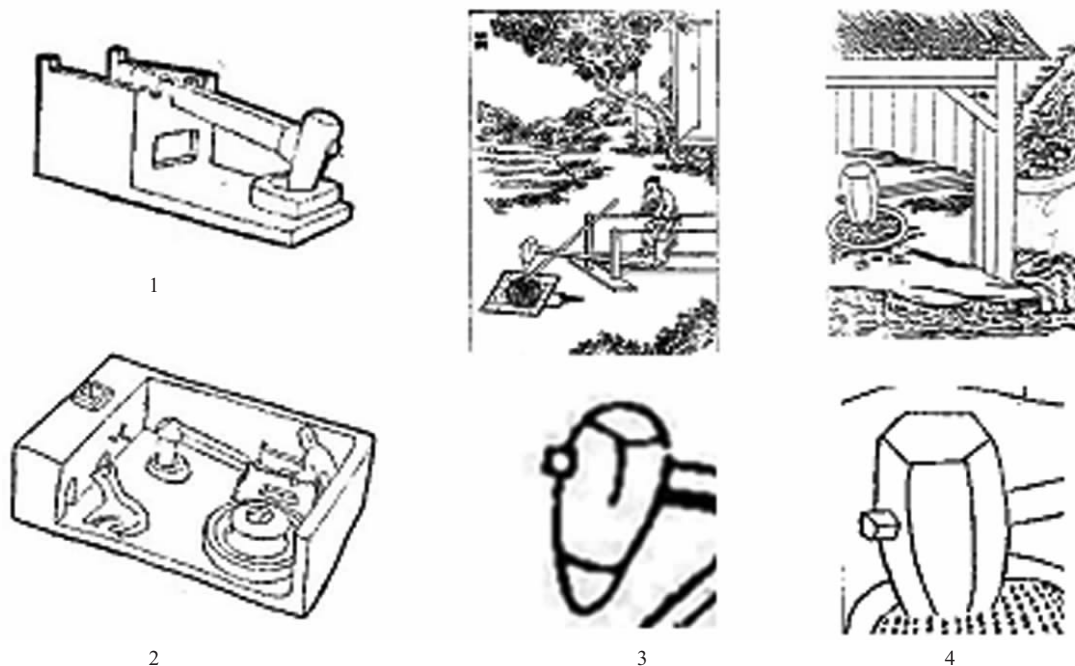
起讲,因而极易误会。《荀子·大略》杨倞注坐实为“至其首而方”,孙诒让疏理解为“头方如椎”,都是误寓意为形体,当然不符合《考工记·玉人》以及郑玄的原意。

“椎头”与“碓头”的异文,也可证前者不是方的。《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鐃和鼓。”郑玄注:“鐃,鐃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南朝梁沈约《宋书·乐志》:“鐃于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今民间犹时有其器。”据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鐃于是一种击奏铜制钟体鸣乐器。其形制较长大,上粗下细,截面大多呈椭圆形,少数呈椭圆形<sup>②</sup>。出土实物显示随着时代变迁,鐃于的形制也发生变化,春秋以前为坛瓮状(图三,1),战国时期呈圆棱四方椭圆束腰状(图三,2),战国晚期到至东汉,器形为上大下小的椭圆直筒状(图三,3、4、5)<sup>③</sup>。据此可知,鐃于的形制虽有变化,但从战国至汉代大体呈上大下小形,这与《鼓人》的“圆如碓头,大上小下”郑玄注完全吻合,故可确认无疑。

碓是舂米的工具,《说文解字·石部》:“碓,舂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舂以手,碓以足。”公元前两千多年发明了杵臼,到了汉代,不仅有手执之杵,而且有脚踏的碓,东汉王充《论衡·效力篇》:“碓重,一人之迹不能蹈也。”用柱架起一根木杠,杠端系石头,用足踏杠杆以举碓,连续起落,脱去下面臼中谷粒的皮,功效比手杵增加数十倍。东汉桓谭《新论·离事》:“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碓头的形制上大下小(图四,1~4)<sup>④</sup>,而鐃于“圆而大上小下,正碓头之形”<sup>⑤</sup>。

无论形态还是功用,“椎”与“碓”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且两字声母相近韵部相同,因而在形容鐃于时或有通用。上揭郑玄注“鐃,鐃于也。圆如碓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提供了或本异文:“碓,本又作椎。”《山海经·中山经》“鐃于”晋郭璞注:“鐃于,乐器名,形似椎头。”唐徐坚《初学记》卷十六引《古今乐录》:“鐃,鐃于也,圆如椎头,上大下小。”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七五引《乐书》:“鐃于也,圆如椎头,上大下小。”均以“椎头”形容鐃于,这表明“椎头”是圆的可能性很大。假如“椎头”方而“碓头”圆,换用的概率肯定会大大降低。而“圆如椎头”是排斥郑玄注“方如椎头”的,除非如上文所论——“方”不是“椎头”的外体而是寓意。相比之下,孙诒让仅仅根据郑注“方如椎头”,就把《经典释文》或本、《初学记》引《古今乐录》、《山海经》郭注的“圆(圆)如椎头”一概斥为“传写之误”<sup>⑥</sup>,其理据可信度则显得低。

琿又谓之“大圭”,贾疏云:“言大圭者,以其长,故得大圭之称。”《考工记·玉人》“大圭”之上下文为:“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大圭长三尺……土圭尺有五寸……裸圭尺有二寸……琿圭九寸而缁……琿圭九寸。”前后所论皆为圭,则大圭之形制必类于他圭而尤长大。圭之形制见于经文《礼记·杂记下》:“赞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博三寸”则圭之宽与笏宽等,而圭“剡上”,剡,削、削尖也,引申为锐利。《楚辞·九章·橘颂》:“曾枝剡棘,圆果抟兮。”王逸注:“剡,利也。”文献所载“圭”上端锐利,成尖锐之形,



图四 碓

1. 汉代脚踏碓 2. 美国奈尔逊美术馆所藏汉代陶碓房 3. 《天工开物图说》插图 4. 《农政全书校注》插图

故左右各寸半,为中宽之半,下端长方形。

圭是先秦时代重要的瑞玉,为“六瑞”<sup>②</sup>之一,历代学者对其形制却有不同认识<sup>③</sup>。圭之早期图形见于东汉柳敏碑阴“六玉”图<sup>④</sup>(图五),也见于其他汉碑<sup>⑤</sup>(图六),下端平直,上端呈三角形。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考证圭之形制,“第二种瑞玉是圭,作扁平长条形。下端平直,上端作等边三角形”<sup>⑥</sup>。该意见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因为这种形制的器物不仅合于汉碑上所见的圭(图五、图六),也多见于考古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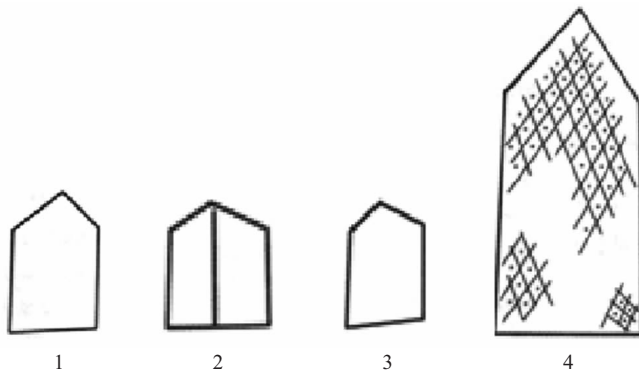
西周玉圭一般为尖首长条形,上尖下方,圭身多

是素面,如陕西省扶风县黄堆村25号墓出土的两件玉圭,西周中期礼仪用玉。左残长5.5、宽1.1、厚0.1厘米,右残长5.8、宽0.8、厚0.15厘米。呈尖首长方形,左圭两面平整,中部似残断,右圭中部起脊,底部似残断,两器均通体磨光,光素无纹(图七,1)<sup>⑦</sup>。

春秋战国时期,圭开始广泛使用。圭主体狭窄,圭角尖锐,例如:山西省侯马市秦村盟誓遗址出土的一件玉圭,是春秋晚期礼仪用玉,长20.3、宽4.3厘米,扁平,尖首,两边斜直,底边平整(图七,2)<sup>⑧</sup>。河南省辉县固围村1号墓祭祀坑出土一件玉圭,是战国中期礼仪用玉,长18.8、宽5.8厘米,扁平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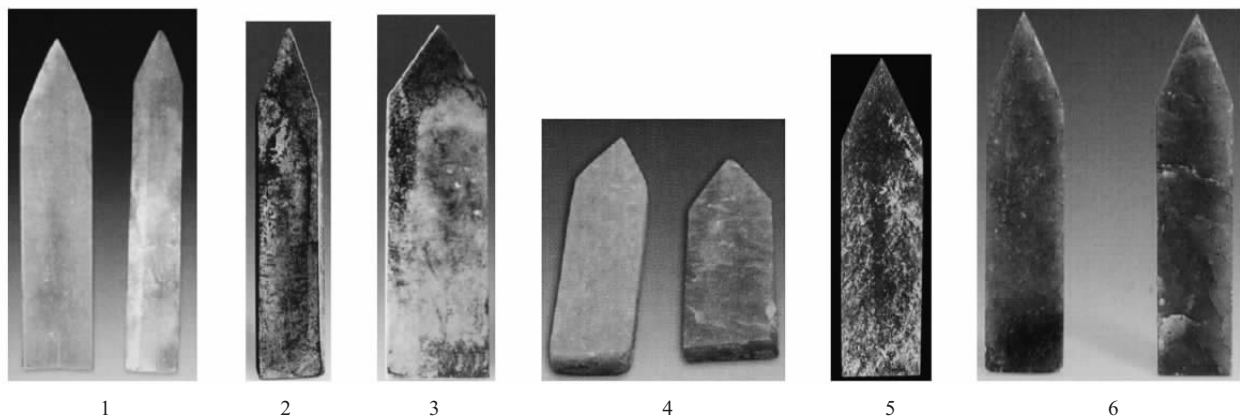


图五 东汉柳敏碑阴“六玉”图



图六

1. 汉单排六玉碑玉圭 2. 益州太守碑阴玉圭  
3. 汉六玉碑玉圭 4. 汉武梁祠画像石玉圭



图七 尖首玉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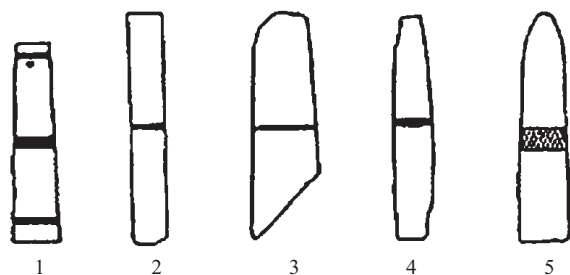
西周时期：1. 陕西省扶风县上康村 M2 春秋战国时期：2. 山西省侯马市秦村盟誓遗址 3. 河南省辉县固围村 1 号墓祭祀坑  
秦汉时期：4.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联志村祭玉坑 5. 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 6.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 7 号墓

形尖首，平底。一边磨平，另一边有切割痕迹，底部有一钻孔。器表无纹(图七,3)<sup>③</sup>。

玉圭在秦汉时期仍有使用，其形制与前代基本一样，以青玉制作，尖首平底、素面，多无孔，西汉中期有在下部穿一孔者。秦代玉圭除西安联志村的以外，在山东烟台芝罘原阳主庙后殿前秦代祭祀坑中也出土两组玉器，其中有圭。西汉以后玉圭发现较少。例如，陕西省西安市北郊联志村祭玉坑出土秦代礼仪用玉两件，左圭长 8.5、宽 2.1 厘米；右圭长 7.1、宽 2.5 厘米，均青色，素底无纹(图七,4)<sup>④</sup>。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玉圭，长 9.4，宽 2.35，厚 0.4 厘米，青玉，上端射似等腰三角形，下端为平直的长方形(图七,5)<sup>⑤</sup>。江苏省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 7 号墓出土的西汉仪礼用玉两件，均长 7.1、宽 2、厚 0.2~0.4 厘米，玉质青色，中有黑点。器扁平状，长方形出尖(图七,6)<sup>⑥</sup>。

考古发现的玉圭(石圭)除了尖首圭，还有平首圭，例如：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早期墓中的二层台上出土一件石圭，由淡黄色细砂石制成，长条形，两头平，上窄下宽，窄端钻有一圆孔，长 13.8、上宽 2.1、下宽 3.3、中间厚 0.8、两端厚 0.4 厘米，通体抛磨，光素无纹(图八,1)<sup>⑦</sup>。陕西扶风县黄堆三号西周墓中出土两件玉圭，第一件为月蓝色，边缘有棕褐色斑，长条扁形，上下端平齐，上端略有收杀，通高 11.2、宽 1.9，厚 0.2~0.4 厘米，出土时位于墓主人骨架腹部(图八,2)；第二件玉圭为墨玉，甚薄，上下两端均残，从残存情况推测，当时的完整形制可能为梯形，出土时位于椁内的扰土之中(图八,3)<sup>⑧</sup>。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二十二号西周中期墓出土一件白色略泛黄的玉圭，长条扁形，两端平齐，中部

较大，形制不甚规整，通高 22.4、宽 1~1.9、厚 0.4 厘米。通体光素无纹<sup>⑨</sup>(图八,4)。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一号西周晚期墓中出土一件汉白玉圭，长条扁形，上端收杀成平顶，下部呈长方形，通高 11.6、宽 2.8、厚 0.6 厘米，通体抛光，素面无纹(图八,5)<sup>⑩</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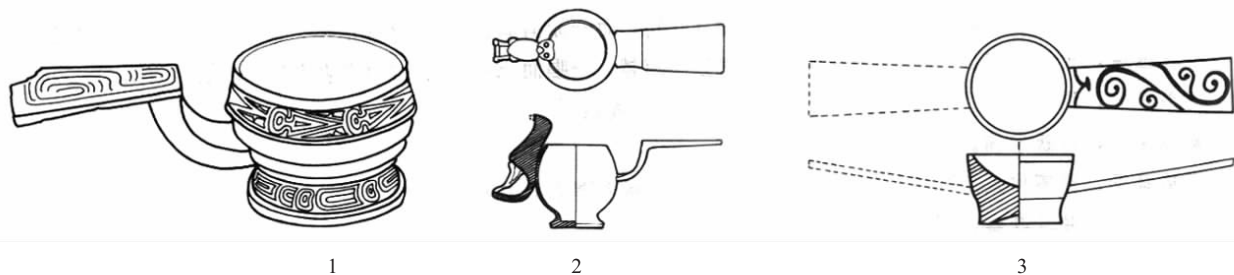
图八 平首圭

1. 山东省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葬 2. 扶风县黄堆 M3  
3. 扶风县黄堆 M3 4. 扶风县黄堆 M22 5. 扶风县黄堆 M1

文献载有“瓚”，《考工记·玉人》“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庙。”郑注：“瓚如盘，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诗·大雅·旱麓》孔疏：“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长尺有二寸。其赐诸侯，盖九寸以下。”孙诒让正义：“尺有二寸者，圭之长度，不兼瓚言之。裸圭与镇圭同度，故亦谓之太圭，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太圭’是也。”瓚是用来舀挹鬯酒的勺，也可用作赏赐之物，如《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大雅·江汉》“釐尔玉瓚，秬鬯一卣”。可以见到的出土实物，有青铜器(图九,1)、陶器(图九,2)、漆器(图九,3)<sup>⑪</sup>，勺柄通常做成圭形，应于文献记载“其柄用圭”，圭柄的形状柄末宽，柄端窄，呈梯形，这与上面所举的平首圭相同。

细玩《玉人》“杼上终葵首”，“杼”为“削减”义，《周礼·考工记·轮人》：“凡为轮，行泽者欲杼。”郑玄





图九 瓚

1. 伯公父铜瓚,陕西扶风出土

2. 陶瓚,河南辉县出土

3. 木胎漆瓚,河南正阳出土

注:“杼,谓削薄其践地者。”又此经郑注:“杼,綱也。”《玉藻》郑玄注:“杀,犹杼也。”“綱”即“杀”,杼、杀互训。杀亦有“减省”义。《周礼·地官·廩人》郑玄注:“杀,犹减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何休注:“杀,省也。”“杼上”犹言上端略有削减,即笏之“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天子之“珽”与诸侯大夫的不同,在于“杼上”之上犹有首,故长于二尺六寸之笏,经文曰“长三尺”。

根据以上对经文的梳理,结合出土实物的形制分析,其中呈梯形或中间宽两端窄的平首圭,上端都略有收杀,与出土所见的椎(锤)形略相似。珽既然又称作“大圭”,则形制当类于“圭”,《考工记》言“杼上,终葵首”,则与“剡上,左右各寸半”的尖首圭不同。“终葵首”即“椎首”,椎的形状多是腰鼓形、椭圆形、下宽上窄形,其端首呈往上收缩状,由此“杼上,终葵首”与出土所见的下宽上窄的平首圭形制吻合。《考工记》仅言“杼上,终葵首”,郑玄说“于杼上又广其首”,不免有增字解经之嫌。

顺便指正的是《集韵·青韵》所记的尺寸有误:“珽,大圭,长尺二寸。”上揭《考工记》、《说文》、《荀子·大略》杨注、《左传》杜注、《诗经·商颂·长发》陆德明释文、《礼记·玉藻》郑注,皆云“珽,大圭,长三尺”。《集韵·青韵》所记“长尺二寸”者,当为“介圭”,亦谓之“玠”。《说文》:“玠,大圭也。”《尔雅·释器》:“珽大尺二寸谓之玠。”邵晋涵正义:“玠,亦作介。”《广韵·怪韵》:“玠,大圭,长尺二寸。”④《诗经·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郑玄笺:“圭长尺二寸谓之介。非诸侯之圭。”《书·顾命》:“太保承介圭。”孔传:“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介圭即镇圭,《周礼·考工记·玉人》:“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介”有大义,《易·晋》“受兹介福”陆德明释文:“介,大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寡君之贵介弟也”杜

预注:“介,大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杜预注:“介,大也。”《诗经·小雅·大明》“介尔景福”毛传:“介、景,皆大也。”戴震指出:“大有二义,以尊大言者,镇圭、命圭之为大圭是也;以长大言者,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是也。”⑤介圭乃天子守之,尤为尊贵,故又谓之“大圭”,珽为圭之尤长者,亦谓之“大圭”,《集韵》混淆二者,张冠李戴,应当指正。

注释:

- ①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330页,中华书局,1987年。
- ②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331页,中华书局,1987年。
- ③ 《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新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
- ④ 《戴震全集·考工记图》,第770页,中华书局,1980年,“镇圭,瑞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执镇圭。笏亦谓之手版。徐广《车服仪制》曰:‘古者贵贱皆执笏,即今手版也。亦谓之薄。天子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管子》曰:‘天子执玉笏以朝日。’是也。其首六寸,谓之珽,近首盖杀半寸。凡笏,广三寸,杀半寸,自中已上渐杀,笏上广二寸半也。”
- ⑤ 《礼书通故·名物图二·玉》,第2357页,中华书局,2007年。
- ⑥ 《三礼通论》,第249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第12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 ⑧ 《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兵器、刑具》,第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⑨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终葵》引马融《广成颂》“挥终葵,扬关斧”,认为“古人以椎逐鬼”,如同大雉执戈扬盾。按照黄以周的图示和数据,珽不仅形似方形的椎,而且首与身的比例是1:4.33,与《墨子》椎的比例接近(1:4或1:6)。据此,则天子所搢的大圭,远观竟无异平民劳作所操的长椎或传说逐鬼所用的终葵。

⑪ 湖南省文物工作队:《长沙、衡阳出土战国时代的铁器》,《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⑫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⑬ 湖南省博物馆、麻阳铜矿:《湖南麻阳战国时期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2期。

⑭ 大冶钢厂、冶军:《铜绿山古矿井遗址出土铁制及铜制工具的初步鉴定》,《文物》1975年第2期。

⑮ 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⑯ (图二8、9、10)皆转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⑰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空心砖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

⑱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第11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⑲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编著:《高庄汉墓》,第45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112、11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㉑ 转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㉒ 转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3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㉓ 《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第三册《秦汉时代》,第114~11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

㉔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镇平县文化馆:《河南镇平出土的汉代窖藏铁范和铁器》,《考古》1982年第3期。

㉕ 孙诒让《周礼正义》:“注云‘方曰簠,圆曰簋’者,贾疏云:‘皆据外而言。’凡器方圆并当据外言,钱亦内方外圆,而称圆法,是其比例。贾说深得郑指。《说文·竹部》云:‘簠,黍稷圆器也。簋,黍稷方器也。’又《淮南子·泰族训》许注云:‘器方中者为簠,圆中者为簋也。’是许君谓外圆内方者为簠,内圆外方者为簋,其说与郑正相反,盖师说不同。”(中华书局,1987年,第1230页)

㉖ 琕从玉廷声,从“廷”得声之字多有挺直义,据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二认为“琕、挺、琕、挺、琕、挺、琕、挺並有直义”,刘师培《正名隅论》认为“琕、琕、琕、琕、琕、琕、琕、琕並有挺生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65年,第81页)。

㉗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33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㉘ (图三1、2、3、4)据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中国古代簠于概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三5)据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松桃出土的虎钮于》,《文物》1984年第8期。

㉙ (图四1、2)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

订本),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图四3)引自明宋应星著、曹小欧注释《天工开物图说》,第19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图四4)引自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第4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㉚、㉛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902页,中华书局,1987年。

㉜ 六玉:璧、琮、圭、璋、璜、琥。见于《仪礼·觐礼》:“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周礼·春官·大宗伯》谓之“六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这是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以不同的器形和不同的玉色以配合天地四方。汉碑中的“六玉图”用“璫”代替“琥”。

㉝ 孙庆伟:《西周玉圭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文物世界》2000年第2期)将历代学者的观点归纳为四个系统:《说文》系统、郑注《周礼》系统、汉碑画系统和吴大澂《古玉图考》系统。

㉞ 洪适:《隶续》(卷五),第3~6页,洪氏晦木斋丛书本,1872年。

㉟ 节选自周南泉:《中国古代玉、石璋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㊱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㊲ 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10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㊳、㊴ 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17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㊵ 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22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㊶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卷》,第183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㊷ 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22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㊸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图五〇:5。

㊹、㊺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黄堆西周墓地钻探清理简报》,图五:17,《文物》1986年第8期。

㊻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黄堆西周墓地钻探清理简报》,图三:16,《文物》1986年第8期。

㊼ (图九1、2、3)转引自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第19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㊽ 《集韵》于此最是抵牾,两处皆为“大圭,长尺二寸”,《广韵》释“玠”,《集韵》释“琕”,必有一误。

㊾ 转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323页,中华书局,1987年。





## 本期导读

孙机先生《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一文进一步讨论了铜奔马的年代问题。武威雷台发现了一整套由铜车马和骑马俑组成的出行仪仗,铜奔马是这套仪仗中的一件。铜马昂首嘶鸣,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附着一振翅飞翔的燕子,飞燕回首惊视,骏马已经超越在前。古代传说的天马行空的壮丽景象再现人间。铜奔马优美姿态与精湛的工艺举世瞩目,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铜奔马出土以后受到考古界的重视,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对于铜奔马的年代,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孙机先生充分展示了争议各方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其主张自然清楚了。孙机先生著述十分丰富,成就卓然,是当今古代器物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方法、治学思想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顾莉丹、汪少华先生《说“珽”之形制》一文论述一个古代的重要礼器“珽”,“珽”也叫大圭,因为事关皇家礼制,因而历来重视。文献所见之“珽”,始见于《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方如椎头”说法解释“终葵首”为方形,传统的大致承袭此说。《新定三礼图》据此给出了方头略似榔头的图形。但是这种形状的圭从未见于考古发现,传世文献记载常常与考古报告相背,引起对传统文献内容的怀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问题出在对于“椎”的描述,考古出土的椎首常态是圆柱形、椭圆形或腰鼓形,而非方形,虽然有平首圭,形制亦与经学家所说不同。本文在正确释读传统经学文献后,作出了合理的训释。同时调查了大量考古实物、汉代画像石图形资料,给人以较为可信的结论。

陆锡兴《汉魏以来之泥冥钱》一文论述了汉魏南北朝到唐宋的泥冥钱问题。泥冥钱在战国、西汉曾经盛极一时,考古发现的实物有相当数量,因为其年代久远,形制繁多,早就引起注意,不乏专门论述。东汉以还的泥冥钱,发现得少,制作简陋,并没有得到重视,至今尚属空白。其实这个阶段是冥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经历泥质向纸质转变的环节。因为泥冥钱出于考古发现,纸钱多见于传世文献,其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两个材料来源不同的冥钱却被分割为考古学和民俗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这段考古资料的梳理,不仅指出了泥钱的消亡期和纸钱的发生期,而且探讨了兴衰的原因。作者在冥钱史的探索方面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本文在内,基本上完成了各个时代、各个环节的研究工作,为撰写《中国古代冥钱史》准备了较为完善的基础。

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各个考古发现具有静态的、个别的特点,历史文献可以提供考古发现的背景等大量的信息,能把考古发现的器物串连起来,形成完整面貌,甚至全面的发展过程。所以对于器物的通史研究必须文献与实物并举,这是一个铁定的法则。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辨别、正确认识的问题,以上两者也是如此,孙机先生和顾莉丹、汪少华先生的文章都做到了这点。

(陆锡兴)